
同步推进传统浙学与当代浙学

钱茂伟（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、史学史研究所所长）

所谓浙学，当然是浙江的学术与文化，或者说以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为代表的浙江学术与文化。从空间上说，因为浙江学术是从南宋的“两浙东路”内崛起的，开始倒被称为“浙学”，清初被为“浙东学派”，清中叶被称“浙东学术”，民国时期甚至被称为“浙东史学”。今日，因为更强调“浙江”，自然使用“浙学”更好。文化浙江建设，是最近浙江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奋斗目标。对浙江学界来说，建设文化浙江，应当聚焦“当代浙江”“当代浙学”“当代浙人”“当代浙派”建设。从我的角度来说，既要做好传统浙学研究，又要关注当代浙学研究。我主要讲三大主题：

一要重视大项目。回顾近十多年浙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，项目尤其是大项目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2002年时，吴光主持了《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》，最后出版了《阳明学研究丛书》（2010年）11种。2007年，又出版了“阳明后学文献丛书”第一辑10册。2014年以后，又出版第二辑10册。在没有基础类与跨学科类重大项目制时代，这个重点项目已近于重大项目了。浙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始于2010年的“浙东学派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”，由浙江师范大学承担。此后，2013年，宁波大学取得“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”。2014年，浙江师范大学取得“《明文海》、《明文案》、《明文授读》及张宗祥《增订明文海》整理与研究”。2015年，浙江社会科学院“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”又入选立项。2017年，又将有几项大项目。在近几年浙学主题的重大项目竞争中，浙江师范大学最早觉醒，项目最多。宁波大学、浙江社会科学院也奋起直追，获得了相应的项目。2005年以来浙江历史文化工程项目前后十多年，极大地推进了浙学的研究，如浙江文化传记丛书、浙学文献集成。第二期浙江历史文化工程也于2017年开始，这将使浙江历史文化工程建设再创辉煌。

除了国家哲社规划办、省哲社规划办外，各地研究中心的组建也有力地推进了浙学相关项目的执行。如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（宁波大学）、江南文化研究中心（浙江师范大学）、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（浙江社会科学院）。后来，宁波大学成立了市级浙东文化研究中心。2010年，宁波大学成立了校级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。2016年，浙江师大报浙学研究院。这些基地每年都会列一些浙学相关的项目，从而大大促进了专门的浙学研究。2015年底，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中心承担了市社科院重大项目《浙东学术史》四卷本。今年，绍兴文理学院成立阳明国际研究院，也设立了一系列的项目。这些重大项目的实行，相信会大力推进浙学的研究水平。

大投入才有大产出，项目制同样适合文科。最近有台湾人发现，中国之所以快速崛起，长期规划、五年规划、重大项目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浙学要发展，仍得在重大项目上着力。各级规划部门、各级研究单位，仍得在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的培育上下功夫。从其他一些省市经验来看，他们先立为校级、市级、省级重点或重大项目，然后在此基础上申报教育部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，这样的成功概率会更高。

二要拓宽研究选题。以上讲了浙学规划、项目在机制上的促进作用，下面重点关注浙学选题。经过近四十年发展，传统浙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域，重要的、可做的选题都做完了，剩下的都是在现有研究视野下认为不太重要的选题。如果没有视野的转换，选题与文献的挖掘，要推进浙学研究是不太可能的。在今日时代，浙学研究要做好“三个面向”：面向国际，讲好浙学故事；面向国内，讲好浙学故事；面向公众，讲好浙江通俗故事。应从国际与国内视野来观察浙学的发展历程，要从社会史与学术史互动的角度来思考特色。浙学的形成，是与秦汉以后北方汉人的不断南迁、移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联的。同时，受到了浙东沿海的海洋文化氛围的影响。在海陆相兼、农耕与海洋文明相兼的社会背景下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浙学。多卷本浙学的研究，应在现有相关专题研究成果上，深度地、立体地展示浙东学术发展轨迹，建构一个更为宽广的浙学知识平台。在文献上，要建设浙学研究的数据库平台。要编选《浙学研究读本》，加强浙学研究人才的培养。在研究对象上，要向下延伸，挖掘二三流人物加以研究。笔者承担的《浙东文化新史料研究》（最后定名《元代以来浙东学术文化新探》）正是这种

理念的尝试，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开拓选题。

三要关注当代浙江公众史记录，总结当代浙江人创业创新故事。近年来，我的关注视野不断往下延伸，已经涉及当代浙学的研究。2010年，成《当代浙江史学编年考》，这是一种尝试。2012年以来，我重点建构了公众史学，2015年出版《中国公众史学通论》。公众史学视野的提出，让我对当代浙学的研究有了全新的思考。第一期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结束后，浙江最显眼的文化建设工程是浙江文化礼堂建设。由浙江宣传部、文化厅推动的浙江文化礼堂项目，是相当不错的基层文化载体，是农民自己的精神家园，公众史学在其中就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。据统计，2012—2017年，全省已累计建成6527个农村文化礼堂。预计到“十三五”末，浙江将建成1万个高水平农村文化礼堂，覆盖80%农村人口。我看过部分文化礼堂，文化效益并不明显，有的近于村史博物馆，更有的成为红白喜事场所。农村文化建设，第一步应在硬件建设上下功夫，第二步则要在文化软件上下功夫，应加强乡村历史文化记忆的积累，积累当代乡村个人史、家族史故事。在此基础上，可以编辑不同层次的当代浙江个人史、当代浙江家族史。对乡村来说，应大力推广家谱编纂。浙江是家谱编纂的首善之区，宋明以来，民间的私谱编纂活动一直未停滞。即便1950—1979年，浙江部分村落仍在编纂家谱。1980年以后，更是进入繁荣时期。据2005年出版的《浙江家谱总目提要》统计，现存家谱有1.2万余种。其中，民国时期浙江修谱4498种，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修谱总量为1598种。家谱形式多样，多数是因袭，但也有创新之处。村谱如宁波鄞州区下应街道的《史家码村谱》的出现，就是值得肯定的事。传统的家谱编纂，多是大族进行的。问题是，村中除了强宗大族外，尚有不少小姓。大姓修谱，多少会引起小姓的内心不平衡。新型态村谱的出现，既适应了户籍管理的地域化趋势，又适应了各姓均编家谱的希望。同时，村两委也可明正言顺地介入，提供经费、场地，聘请人才，体现执政党的权威领导，是真正的民心文化工程。此外，就是我近十年在大学生推广的小家谱编纂活动。这是一种五代直系家族史，规模小，成本低，更具操作性。浙江省应建立长效机制，进一步投入经费，让大家共同起来参与乡村文化建设。

从当代浙江民众历史中挖掘记忆资源，抢救个人记忆资源，基本手段是口述史，通过口述史，建构浙江人记忆信息库。当代浙江既存在退休老人再使用，也存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。既面临大数据竞争问题，也面临全社会对口述史实践认知不足问题。老人的记忆可以提升大数据积累，口述史可帮助老人留下历史记忆，老人的口述问题可由大学生来解决。由口述史入手，可以一石四鸟，解决四大问题。浙江有网络优势，有文化优势，两者结合就可建立当代浙江人记忆库。人类记忆库建设可丰富档案馆、图书馆资源建设，提升浙江在大数据竞争中的优势，加强文化浙江的建设力度。我们主张将民间个人记忆开发活动上升到浙江文化战略层面，希望得到更多的政策与财政支持。具体地说，浙江各级政府要给口述史发展以政策与投资，应加强口述史信息征集重要性宣传工作，设立口述史基金会，鼓励大学毕业生合伙成立口述史事务所，在社区、车站、码头、公园等公共场所设立故事亭，在干休所、养老院建立生活故事馆，各级档案馆或图书馆承担人类历史记忆库建设工作。总之，多方努力，多管齐下，就可建立起地方性的浙江人记忆库。如此，可以留下老人历史记录，创造大学生就业，提升大数据竞争能力，推动当代浙江历史记录行业的发展。学人在此间的作用，就是开展理论研究，推动当代浙江公众史记录的实践活动。这项文化活动成功，就可以树立当代浙江在全国的领先地位。我们之所以要不断强调浙学研究，就是因为浙江学人在许多转型时期，走在了全国同行的前列。我们研究传统浙学，就是为了继承先人的创新精神，成为新时代的前沿领跑人。